

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曹操法家路线的形成及其局限性

唐 长 孺

(一)

曹操是封建社会进入中期以后的杰出法家人物，他生活在东汉政权崩溃的时代。

东汉政权是由世族豪强控制的。长期以来，推行一条儒家路线，政治上实行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名教之治”，组织上实行在儒家虚伪德行装饰下的“任人为亲”路线，思想上提倡尊孔读经，宣扬天命论。世族豪强是儒家路线的阶级基础，历史发展的障碍。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占有成千上万的“徒附”、“田客”等封建依附人口，也还有成群的奴婢。大大小小的世族豪强各霸一方，控制宗族乡里。他们世代传经，开门授徒，宣扬孔孟之道，借以麻痹人民，培植为儒家路线效劳的反动儒生；他们还利用操纵所谓“乡闾清议”，把持选举官吏的道路，保证他们的家族大的“四世三公”，“家世二千石”，小的也“世仕州郡”（世代当州郡机构的属官），形成大大小小的世袭官僚贵族。他们组织家兵，镇压农民；喂养“剑客死士”当他们的打手帮凶。在东汉政权的繁重赋役下，和以世族豪强为首的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下，大量农民破产流亡，有的继续沦为“徒附”、“田客”，有的流离失所，在饥饿疾疫中，沿路死亡，“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往往有之”（1）。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弄得“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2），“百姓虚县（同悬），万里肖条”（3）。

东汉政权的腐朽统治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分散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次数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单从公元155年（桓帝永寿元年）曹操出生那年起到公元184年（灵帝中平元年）黄巾大起义以前，历史上有纪载的就有十二次。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掀起了席卷全国的革命大风暴。起义军兵威所及，沉重打击了世族豪强乃至整个地主阶级，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动摇了世族豪强控制的东汉政权和他们奉行的儒家路线的统治，对阻挡历史前进的腐朽势力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张角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暂时被镇压下去，以黄巾和黑山等名义起来的各地农民起义军继续斗争，他们“父兄殁，子弟群起”（4），英勇抗击各地割据军阀势力，坚持了十几年之久。

“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沉重打击了阻挡历史前进的腐朽势力，为历史的前进扫清道路。东汉政权是腐朽力量的总汇，儒家路线的神经中枢，它的动摇瓦解是世族豪强势力被削弱的重要标志，改造黑暗统治的前提，乡村邑聚是世族豪强的老巢，起义军焚烧官

府，攻打邑聚，是对世族豪强势力一次广泛深入的扫荡。只有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才能踢开绊脚石，历史才能继续前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张角领导的大起义才被镇压下去，农民起义军的火焰还在燃烧，世族豪强和州郡长官眼看东汉政权在风雨飘摇之中，为了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军，为了维护儒家路线，他们更加需要各自组织和扩大反动武装力量。封建割据形势更加严重。同时，长期存在的宦官、外戚、官僚（广义上都是世族豪强）间的矛盾重又激化。在公元189年（中平六年）的一次火并中，凉州大军阀、大豪强董卓夺取了朝廷大权。关东州郡长官为了扩大势力，占领地盘，组织了讨伐董卓的联军。那些州郡长官全部都是世族兼名士，在讨董名义下，各种地方割据势力，所谓“名豪、大侠、富室、强族”纷纷组织武装，“飘扬云会，万里相赴”，造成“大者跨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5）（大的跨据几个郡，中等的占据一城一县，小的集结在农村。）的全国大分裂局面。讨董是假，乘机割据称雄是真，大小割据势力一方面各自镇压妨碍他们割据的农民起义军，另一方面又互相厮杀，混战不休，弄得“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6），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祸。

导致这场大灾祸的是世族豪强和他们奉行的儒家路线。要结束这样一个全国大分裂、社会生产大破坏的局面，就必须和世族豪强进行斗争，用一条法家路线来代替儒家路线，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曹操就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法家人物。

（二）

曹操早年也只是个有革新要求的进步人物，据说他“不修行业”，“行”是德行，业是学业，当时指儒家的经学。通晓经学，在儒家宣扬的这套道德方面表演一番，叫做“经明行修”，是东汉通行的猎取声名，升官发财的道路，曹操对这不感兴趣。在年青时，他只当过洛阳北部尉、顿丘令、议郎、济南相的官职。

曹操生长在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东汉政权危机四伏以至崩溃瓦解的时代。连绵不断的分散性农民起义终于汇合为黄巾大起义的革命风暴。对于农民起义，曹操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一定要镇压，事实上他也这样干了，同时从维护地主政权出发，阶级斗争迫使他必须思考激化阶级矛盾的原因是什么。这就导致他对于世族豪强及其奉行的儒家路线的不满，使他逐步从世族豪强中间分化出来逐步形成一条革新进步的法家路线。宦官是东汉末年腐朽集团中最得势，也是腐朽性暴露得最充分的一个。曹操出身于宦官养子家庭。这个家庭长期以来和宦官集团有密切关系，阶级斗争推动曹操走出家庭，使他一登上政治舞台就站在宦官的对面，这是他从世族豪强分化出来的第一步，也是走向法家路线的第一步。

曹操反对宦官，要求革新，使他响往打着反对宦官旗号的名士。这一点在他三十年后所写的《自明本志令》中说得很坦率。他说：“我被举为孝廉时，年纪还轻，自以为不是清高有名之士，怕被天下人耻笑，看作凡夫愚人，就想当个太守，好好的在政治上、教化上干一番，让天下知道”。这几句话充分表达了他向往名士的心情，他迫切希望通过他的政治活动，向天下名士表明他反宦官的立场，以便置身于名士的行列。

名士是儒家路线的产物。在法家看来，这叫做“释法而任私议”（7）“不以功伐课试，而好以名问举措”（8）。东汉的名士多半就是世族官僚，或者和世族官僚有密切联系的儒生。

他们基本上是世族官僚集团的组成部分，并没有什么进步性。但是，也须看到，名士是打着反对宦官的旗号的，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地主阶级中下层当时在思想上、政治上还不能形成坚强的战斗力量，更不能形成和儒家保守、倒退路线相对立的革新进步路线。从当时地主阶级内部派别的形势看来，曹操既然反对宦官，要求革新，就必然要和名士站在一起，这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曹操只是个有革新要求的进步人物，法家思想对他还没有起指导作用，当然谈不到形成一条法家路线。但是我们也看到，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他正在逐步向法家转化，从他刚登上政治舞台之日起，他就跨出家庭，和宦官、豪强作斗争。他在济南相任上，政治上反对宦官、打击豪强、惩治贪污；组织上“平心选举”（虽然具体内容不知道），思想上反对神权迷信。这虽然还不能说明他执行法家路线，但不能否认多少带有不满儒家路线的意味。十四年中，曹操在通向法家路线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农民起义是曹操之成为法家和形成一条完整的法家路线的推动力量，但还需要通过对世族豪强的艰苦斗争。通过这种斗争使曹操认识世族官僚和名士，与宦官一样，都是阻碍革新的腐朽力量，才能进一步明确打击对象，形成一条法家路线。

从公元187年（中平四年）曹操托病还乡到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官渡战胜袁绍一共十三年，十三年政治局面的变化发展，深刻显示农民起义推动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儒法斗争，改变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东汉末年，政治局面是由各个腐朽集团操纵的，中下层地主很软弱，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往往成为宦官以外的世族豪强的追随者。正是由于农民大起义打击了和削弱了世族豪强势力，代表中下层地主利益的政治力量才能开始形成，曹操集团就是这样一种政治力量。十三年中，曹操经历了董卓之乱，镇压收编青州黄巾起义军、平定兖州世族豪强的叛乱，建立了以许昌为首都的革新政权、消灭了割据徐州的吕布、粉碎了凉州军阀残余董卓的阴谋政变，最后，战胜了世族豪强的总代表，儒家路线的守护神、割据四州的大军阀袁绍，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董卓之乱反映了在农民大起义的巨大威力下东汉政权总崩溃的最后完成和腐朽势力各集团的极度混乱。就在这时，曹操开始与世族豪强分道扬镳，形成了代表中下层地主利益的，以革新统一为目标的政治力量。以后八年，曹操和各种世族豪强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政治军事形势向着有利于曹操的方向发展，曹操的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曹操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历史的裁决。历史要求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要求恢复发展社会生产，而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只有推行一条法家路线来代替儒家路线，曹操正是在这一个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了一条法家路线。

曹操成为法家和形成一条路线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阻碍历史发展的腐朽力量的认识。董卓之乱前，曹操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不完全的，董卓掌握大权的时候，腐朽力量集团中的宦官、外戚同归于尽，剩下来作为世族豪强利益代表的主要势力就只有世族官僚和名士。过去，他们曾经在反对宦官的旗号下隐藏自己，这一下暴露了他们正是分裂割据和保守倒退的阶级基础，不反对他们，打击他们就谈不上推行法家路线。曹操参加关东州郡“讨董卓军”时还是个那些世族官僚兼名士的追随者。在这场所谓“讨董卓军”的把戏中，曹操清楚地看到了“军合力不齐，踳踳而雁行”（9），不顾大局，各图割据的情况，对于这一伙有所认识。过去他曾经向往参加名士行列，从这时起，他又跑了出来，走他自己的道路。

二年以后，曹操在兖州牧任上，由于杀死了兖州世族大名士边让，导致了以张邈、陈宫为头子的兖州世族豪强的叛乱，经过将近一年的苦战才镇压下去。张邈是兖州东平的大富豪、大名士，是东汉末年名士榜上有名的“八厨”之一(10)，曾是曹操的至交；陈宫是兖州东郡人，“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联结”(11)，早就跟随曹操。兖州叛乱的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集团、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曹操任兖州牧不久，毛玠就曾建议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修耕殖，畜军资”，曹操虽然“敬纳其言”，却没有能够实行(12)，这表明存在着阻力；曹操要以兖州为根本，进行统一战争，当时就有人预料张邈会不听指挥(13)。曹操杀边让，据说是由于他“不屈曹操，有轻侮之言”(14)，所谓“轻侮之言”，实质上只能是通过边让表达出来的对于法家路线的公然抗拒。杀死边让这个大名士，也正是曹操向兖州世族豪强发出的警告。世族豪强的反抗实际上早在酝酿，以杀边让为导火线，一场激烈的流血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平定兖州叛乱之后一年，曹操接汉献帝迁都许昌。就在这年，曹操作为执政者，旗帜鲜明地以法家观点向汉献帝陈述了他的政治措施十四事，他指出：“昔韩非因韩之削弱，不务富国强兵，用贤任能。”(15)“富国强兵，用贤任能”八个字是曹操十四件政治措施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也是他所有革新措施的指导思想。也在这一年，他开始建立屯田，在《屯田令》中明确宣布要效法秦皇、汉武实行法家耕战政策来统一全国，巩固国防(16)。大致也在这年，由荀彧推荐，他任用了在儒家路线下遭受压抑的法家郭嘉，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得力助手。一条较完整的法家路线已经形成，表明这一个名为汉朝的政权是一个推行法家路线的革新政权。

几年以内，革新政权取得巨大成就，曹操击溃了袁术，消灭了吕布，势力一天天壮大起来。法家路线的胜利必然使腐朽势力更加恐惧，更加仇恨，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保守，儒法两条路线的大决战就迫在眉睫了。

董卓乱后，袁绍实际上是东汉腐朽政权的继承者，他在统治区域内奉行儒家路线，成为世族豪强的政治总代表和许昌革新政权相对立的邺城政权是腐朽势力妄图在全国复辟的总部。公元199年(建安四年)秋天，曹、袁的决战开始了。

正在这时，发生了以凉州军阀残余兼外戚董承为头子的一次阴谋政变。他们一伙密谋颠覆革新政权，据董承自己的话，就是效学吕不韦搞政治投机，“高大门户”(17)。也就是要篡夺大权，复辟儒家路线。正当袁绍十万大军压境的关键时刻，董承一伙在革新政权的心脏许昌搞阴谋政变，实际上是腐朽势力的内外配合，起着袁绍的别动队的作用。公元200年春，曹操及时发觉和粉碎了这次未遂政变，坚决处决了董承这一小撮，这是对腐朽势力，特别是袁绍的沉重打击。

官渡之战是十分艰苦的斗争，其艰苦不仅在于前线作战，而且还在于后方的斗争。后方斗争还不仅在于粉碎董承的阴谋政变，据说当战事紧急的时候，豫州各郡除颍川、阳新外都动摇叛变，甚至一些官员和将领还向袁绍私通信札(18)。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曹操坚持战斗，顶住了逆风，终于战胜袁绍，打退了腐朽势力的进攻，巩固和壮大了革新政权，为统一北方，发展推广法家路线取得决定性胜利。

从官渡战后到公元220年曹操去世还有十九年。在这十九年中，曹操统一了北方(除公孙氏割据的平州外)，法家路线推广到过去儒家路线统治的地区，先后在政治、经济、用人、风俗各方面针对儒家路线，针对世家豪强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和措施。

在这十九年中，曹操推行的这条法家路线仍然在与世家豪强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其中与

孔融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孔融这个大儒自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投奔曹操以后，一贯和曹操唱反调，特别是在公元204年（建安九年）曹操占领邺城，大力推行法家路线，打击豪强的时候。曹操这年九月领冀州牧，他就纠合一些公卿，上书建议恢复周礼“王畿”的制度，妄图不让曹操当冀州牧。那时，袁尚、袁熙兄弟挟带幽、冀二州人口十余万人投靠辽西的乌丸部落贵族蹋顿，妄图勾结蹋顿，复辟袁家割据王国。为了扫除袁家割据残余势力，制止乌丸贵族的侵扰，巩固曹操在统一事业中取得的新胜利，保证法家路线在冀幽并青四州的推行，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曹操决定“远征乌丸”。孔融却在这时跳出来，用冷嘲热讽的手法，恶意攻击，以便动摇军心，破坏统一和革新。对于孔融这种反动言行，曹操曾多次给予警告，但是他顽固到底，凭着他的虚名，交结党徒，扩大他的反动影响。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南攻荆州，预定计划荆州平定后，利用优势兵力，迫使江南孙权投降。正在这时，他却对孙权派来的使者大肆诽谤曹操，又一次破坏曹操的战略部署，阻挠统一。曹操决定把他处死。公元218年（建安二十三年），关中世族豪强吉本、耿纪、韦晃、金祚等一伙（19）在许昌密谋发动叛乱，妄图把汉献帝这具僵尸捧出来，南联刘备，北攻邺城，复辟东汉旧政权。这次叛乱在一夜之间就镇压下去了。史书上说这次叛乱牵连的“衣冠盛门”（20）很多，表明其性质是一次世族豪强对革新政权的反扑。就在下一年，魏讽为头子的一伙密谋乘曹操不在的时候，袭取邺城，响应关羽。这一次叛乱没有发动就败露了。魏讽官不大，但名气却不小，交游很广，“专以鸩合为务，华而不实”（21），正是曹操要制裁的那种树立私党，盗窃名声的名士，他的一伙张泉、刘伟等都是荆州人，特别是南阳或与南阳有关系的人（22），这时正是关羽进攻襄樊，许昌震动之时，显然他们是荆州割据势力残余的代表。

这一些叛乱事件表明在曹操晚期，地主阶级内部两个集团、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非常激烈的，世族豪强和名士时刻都梦想颠覆革新政权，但他们是要复辟、倒退，不得人心，都遭到可耻的失败。

必须指出，尽管曹操和世族豪强间的矛盾是尖锐的，斗争也是激烈的，但是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的矛盾，曹操的革新政权终究是地主阶级的政权。曹操要打击那些破坏革新统一的世族豪强，其根本目的也只能是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相互对抗的阶级矛盾不可能由于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而退居次要地位。相反，正是由于农民对地主的矛盾当时突出表现为对世族豪强的矛盾，从而推动了以曹操为代表的中下层的地主对世族豪强的斗争。

在农民起义的推动下，曹操和世族豪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曹操所能做到的只是限制世族豪强对于统一和社会生产所起的破坏作用。象屯田制是限止世族豪强无限扩大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占有，租调制不准他们逃避赋税，又如“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禁止“阿党比周”则是反对世官世禄和限止他们操纵垄断用人之权，这些措施有利于统一，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就是顺应了历史发展要求，应该肯定。但是曹操不可能彻底打击世族豪强，彻底打击那就意味着在政治上把他们全部赶下台，在经济上消除封建的强烈人身依附关系和被用来补充封建剥削的奴隶制残余，而要做到这样，需要多次的广大农民的革命大扫荡。

（三）

曹操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地主总

要剥削压迫农民，也总要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封建国家的主要职能是镇压农民，维护封建制度。曹操不仅参加镇压黄巾大起义，而且在许昌革新政权建立以后还多次镇压分散性的农民起义。阶级本性不可改变，封建政权的性质也不可改变。

此外，曹操生活在东汉末年，那时候，他所属的那个阶级在逐步走向反动的途中已经走过了几百年，儒家思想在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居于统治地位也有这么长的时间。随着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根本变化，曹操作为一个法家，一个地主阶级的革新家，他的思想行动的主流是尊法反儒，但是他不可避免地随着地主阶级地位的变化而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印记，表现了他的保守性。

曹操并没有彻底否定儒家学说和儒家路线。公元203年（建安八年）他发布的《论吏士行能令》明白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方针，大致在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发布的《以高柔为理曹掾令》说“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直到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他临死前发布的《遗令》中还说“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这些言论贯彻着一个观点，就是目前是“乱世”，“天下尚未安定”，应该要重“功能”，要把刑法放在优先的地位，儒家的古礼且收起来；到了“治平之世”，那么儒家的什么“礼”呀、“德行”呀，就得受到尊重。十七年来，曹操这个观点贯彻于政治、用人、礼教各个方面，反映了他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

因为这种尊法反儒的不彻底性是地主阶级历史地位根本变化在地主阶级革新派头脑中的反映，因而在具有法家思想的革新派中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不是曹操个人的问题。

曹操以前，有法家倾向的思想家王符主张尊法重令，严明赏罚，特别是在用人方面，他反对讲门第，反对重虚名，他说：“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愚，不必世族”（23）。他谴责：“今多务交于以结党，偷世窃名，以取济渡”（24），认为是不正之风。但是王符并不反儒，他认为用人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具有“修身慎行、敦方正直”等这些品德的，这种品德是“化之本”；另一类是“忧君哀民、独覩乱原、好善嫉恶、赏罚严明”的人，这类人是“治之材”（25）。王符所说的第一类人，就是曹操所说的“治平尚德行”的那种“有德”的人；王符所说的第二类人就是曹操所说的“有事赏功能”的“有才”之人。只不过曹操认为当时是“有事”之秋，所以虽然二者并提，着重在于“赏功能”；王符要比曹操早上三四十年，那时农民革命大风暴还没有爆发，东汉政权尚未瓦解，中下层地主非常软弱，所以王符只说到“物有所宜，不废其材”（26）。（亦即曹操的“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他只要求二者都要任用，并没有倾向性。比王符稍晚的崔寔主张“重赏深罚”，“明著法术”，他赞扬汉宣帝的“法治”，谴责汉元帝的所谓“宽政”；但是崔寔并不认为儒家这套所谓“德教”应该抛弃，他说：“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他的观点和曹操“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27）的观点是一致的。

王符、崔寔都生在曹操前几十年，他们有法家倾向，但旗帜很不鲜明，讲话吞吞吐吐，自相矛盾。王符刚写了《三式篇》，认为“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赶忙又写了《德化篇》，歌颂先王的德化。崔寔也是一样，才赞扬汉宣帝的法治，赶快又反起秦来，说要“荡亡秦之俗，遵先王之风”。他们那些尊儒的话部分是“言不由衷”，部分是儒家思想在他们头脑中作怪。总之，表明他们斗争的软弱性。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曹操在继承前辈进步思想的同时，也继承了他们的局限性，但是尽管曹操和他们同处于一个大的时代里，曹操后了几十年，黄巾起义的革命风暴，不仅以武器批判了儒家路线，动摇瓦解了东汉政

权，而且以批判的武器直攻儒家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因而较之王符、崔寔，曹操在反儒尊法上虽然同样有局限性，旗帜就较鲜明，说话更是明快得多。

和曹操同时的仲长统也是个有法家倾向的思想家，他揭露和抨击豪强兼并土地，反对任人唯亲，认为“法有玩于时者（被当时轻忽的法令）可改也。”（28）但是他又申言：“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29）这就是说礼义教化是百世可行的“常道”，刑法却只是一时权宜之计。这不是反映了他反儒尊法的不彻底性么？

曹操任用的一批能为法家路线服务的“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如荀彧都存在着同样的而且更严重的局限性，他是最早弃袁绍而归曹操的谋士，也是曹操最早信任的谋士，曾称之为“我之子房”，他在曹操的统一事业中是出过力的。他出身于儒学世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当然比曹操严重得多。他认为一旦战事结束，就是个“大道流行”，“六礼具治”的世界，因此他建议“聚天下之通才大儒，考论六经”。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和曹操一致的。公元203年（建安八年）发布《论吏士行能令》的同一年，曹操发布了《修学令》，令文一开头就慨叹“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因此要地方“各修文学”（当时文学即指经学），选拔学徒，使“先王之道不废”（30）。我们不能断定曹操这一行动是否即是采纳了荀彧上述意见，但毫无疑问，“考论六经”和“修文学”基本上是相同的。荀彧后来和曹操发生尖锐矛盾，其深刻原因就在于他儒家思想的发展越出了一般局限性的限度，成为路线分歧，曹操才不能容忍。

仲长统面对东汉末年分裂割据所带来的灾祸，怀着消极失望情绪，只想当个安逸生活的隐士，“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希望“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31），跑到道家那里去了。这是和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32），决心完成统一事业而努力的积极精神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把法家路线仅当作“拨乱之政”这点是一致的。他们实际上认为法家路线是一种“救时良药”，一种临时措施，而当他们认为的“治世”已经来临，法家路线就该改变为“常道”的儒家路线。诚然，曹操面临着一个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和分裂是儒法斗争的焦点，推行法家路线就为了统一，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法家的主要精神就是随着历史形势发展的变化而继续革新，继续进步，决不是故步自封，更不是复古倒退，这就是“不法古，不修今”，“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先秦法家的革新进步精神。结束分裂局面，完成统一，只能依靠法家路线，才能取得胜利，而完成统一以后，也必须依靠法家路线，继续革新，继续打击腐朽势力，才能巩固统一。曹操、仲长统把法家路线限制在一个时期内，表明了他们尊法反儒的不彻底性。

应当指出，曹操虽然具有这种局限性，总的说来，他始终认为目前还是个分裂割据的“乱世”，直到临死，还说“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因此，在他一生中，思想上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推行法家路线基本上还是坚决的。因此才能够完成中国北方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止了落后民族的侵扰，恢复和发展了统治区域内的社会生产从而改变了东汉末期封建割据和社会生产被破坏的状态，为历史作出了贡献。

曹操决不是“天才”，也不能创造历史。没有广大农民的持续斗争，特别是黄巾大起义，曹操或者就在世族豪强集团中淹没一生；或者提出革新要求，却遭到压抑，不能付之实施。正是农民的斗争特别是黄巾大起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也推动了曹操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作出他的贡献。

注:

- (1)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建和二年十一月诏。
- (2) 《后汉书》卷八十七《刘陶传》。
- (3) 同书卷九十下《蔡邕传》。
- (4) 《三国志》卷八《陶谦传》注引《吴书》。
- (5)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
- (6) 《后汉书》卷七十八《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篇》。
- (7) 《商君书·修权篇》。
- (8) 《韩非子·亡征篇》。
- (9) 《乐府诗集》卷二十七曹操《蒿里行》，亦载《曹操集》。
- (10) 《后汉书》卷九十七《党锢传序》。
- (11) 《三国志》卷七《张邈传》注引《典略》。
- (12) 《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
- (13) 《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
- (14) 《后汉书》卷一百一十卷下《边让传》。
- (15) 《艺文类聚》卷五十二，亦见《曹操集》。
- (16)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 (17)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献帝起居注》。
- (18)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黄初二年诏，同书卷二十三《赵俨传》。《赵俨传》注引《魏略》。
- (19) 据《三国志》卷三十二《常林传》注引《魏略·吉茂传》，吉家是冯翊蕃姓，吉本是吉茂族人。
耿纪是东汉大功臣耿弇的后代，扶风人。见《后汉书》卷四十九《耿弇传》。金祚是西汉以来的京兆世族。
- (20) 《后汉书》卷四十九《耿弇传》。
- (21) 《三国志》卷二十一《刘虞传》注引《虞别传》。
- (22) 张泉是张绣的儿子，见《三国志》卷八《张绣传》。张绣是京州军阀张济之侄，但久住南阳。刘伟是南阳人，见《三国志》卷二十一《刘虞传》。此外还有经学家宋忠的儿子，南阳人；诗人王粲的儿子，王粲是山阳世族，但久居荆州。
- (23) 《潜夫论》、《尚荣篇》。
- (24) 同上书《务本篇》。
- (25) 同上书《实贡篇》。
- (26) 同上书《实贡篇》。
- (27) 《后汉书》卷八十二《崔寔传》录所著《政论》。
- (28) 《后汉书》卷七十九《仲长统传》录所著《昌言·损益篇》。
- (29) 《全三国文》卷八十八《群书治要》录《昌言》。
- (30) 同上书卷一《武帝纪》。
- (31) 《后汉书》卷七十九《仲长统传》录所著《乐志论》。
- (32) 《乐府·诗乐》卷三十七《神龟虽寿》，亦见《曹操集》。